



『燕行錄』研究論集

張伯偉 編

鳳凰出版社





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

『燕行錄』研究論集

張伯偉 編

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“燕行錄”研究論集 / 張伯偉編. — 南京 : 鳳凰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506-2499-3

I. ①燕… II. ①張… III. ①文化史—史料—中國—清代②《燕行錄》—研究 IV. ①K249.0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257030號

書名	“燕行錄”研究論集
編者	張伯偉
責任編輯	樊 昕
出版發行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 發行部電話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郵編:210009
出版社網址	http://www.fhcbs.com
照排	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印刷	江蘇省句容市排印廠 句容市春城鎮南,郵編:212404
開本	960×1304毫米 1/32
印張	16.375
字數	455千字
版次	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506-2499-3
定價	80.00圓

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511-87871135)

前 言

張伯偉

本書題名《“燕行錄”研究論集》，之所以在燕行錄三字上加引號，是因為以我的學術認知，將高麗、朝鮮時代的使臣或其隨從所撰寫的這批文獻，用“中國行紀”來稱謂是較為合適的，此處使用的“燕行錄”，僅僅是一種姑且從俗的表示。我希望目前還在整理中的《高麗朝鮮時代中國行紀資料彙編》出版之後，有可能將“燕行錄”的稱謂改變過來。

如果要追溯東亞學人對這批文獻的關心，較早可以舉出日本學者中村榮孝，他在1930年5月出版的《青丘學叢》第一號上，就發表了《事大紀行目錄》，最早對這批文獻從目錄學角度作了匯總，儘管遠遠稱不上完備。1933年，中國學者金毓黻在編纂《遼海叢書》之際，收入了柳得恭的《灤陽錄》和《燕臺再游錄》，並且評論說：“異國人記中朝事迹之書，不參利害之見，頗能得真，故可貴也。”表明了對此類文獻的重視，雖然其“不參利害之見”的斷語在今天看來未必真的如此。相較而言，韓國學者的起步稍遲，但大規模地推出此類文獻，還是以他們後來居上。先是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編纂影印了《燕行錄選集》兩冊，七十年代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又以此為基礎編纂了《國譯燕行錄選集》，一方面將這些文獻翻譯成現代韓語，一方面又加上索引等整理手段，最後將原文影

印附錄。就研究而言，較早利用這批文獻探討中韓文化交流的是日本學者藤塚鄰，他在1935年提交的博士學位論文《朝鮮時代清朝文化的輸入與金阮堂》（李朝に於ける清朝文化の移入と金阮堂），在其身後（1975年）整理出版為《清朝文化東傳之研究》（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），堪稱相關研究的奠基之作。就專書研究而言，如崔溥的《漂海錄》，最早是美國學者 John Meskill 的關注，1958年提交了博士論文“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, Pyohae-rok”，1965年正式出版時易名為“Choe Pu's Diary: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”，將《漂海錄》譯為英文並加以注釋。1959年，日本學者牧田諦亮《策彦入明記研究》（策彦入明記の研究）下冊出版，收入了對此書的標點整理本，而且將日本江戶時代清田君錦據《漂海錄》編譯評注之《唐土行程記》與崔溥原書結合起來研究。從研究實績看，其翻譯固難免訛誤，其研究也顯得初步，但上述有關此類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的歷史片段表明，現代學術意義上的“燕行錄”的研究，幾乎從一開始就是“國際性”的，可謂其重要特色之一。

在相關文獻的收集整理方面，韓國林基中教授用力最勤，貢獻尤多，他以一人之力編纂了《燕行錄全集》（2001年）、《燕行錄續集》（2008年）以及光盤版《燕行錄叢刊》（2013年）、《增補燕行錄叢刊》（2014年），後者匯聚了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相關資料556種。又與日本學者夫馬進教授合編《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》（2001年）。到目前為止，林基中教授是出版此類資料數量最多的學者，這些文獻在韓國、中國、日本等地的傳播，也較為廣泛地激發起學者的研究興趣。本世紀以來，在東亞地區出現的越來越豐富的“燕行錄”研究成果，包括學術論文、學位論文、學術專書、國際會議論文集等，與這些資料的大量公佈有直接關係。除韓國學者以外，對此類文獻的關心，從學者和成果的數量來說，以中國為最。不僅有大型的相關文獻陸續影印出版（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《燕行錄全編》，從2010年到2016年已出版四輯46冊），研究論著的數量逐年增加，質量也有所提高。收集在本書中的論文，就反映了這一研究熱潮的側影。

本書由三個部分組成，為方便讀者，茲略作介紹：

一、緒論。從整體上(名稱、文獻、方法)對“燕行錄”的研究提出意見。以名稱來說,此類文獻在學界的命名不一,而以“燕行錄”最為通行,甚至有作任意擴大的傾向,而在學術討論中,最合適的名稱應該是“中國行紀”。主要理由在於:1. “行紀”是一個較為中性、客觀的用語,適合於在學術討論中運用;2. 從文獻淵源來看,此類文獻之祖皆以“行紀”命名;3. 現代學術研究中,涉及相關文獻時,用“行紀”稱呼乃一其名,可以擴展到東亞甚至世界。就文獻來說,此類資料的數量驚人,而且連續不斷,一方面有很高的史料價值,但這些史料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,有雷同,有抄襲,還有作者、時間、真偽等,若不能作系統掌握,很容易陷入“見樹不見林”的泥淖,從而導致錯誤的發生。最重要的是如何研究此類文獻,也就是方法的問題。從現存的零星史料算起,“燕行錄”可以從十三世紀開始。長達六百多年不間斷的對另一個國家全面的觀察記錄,是這批豐富文獻最可寶貴之處,也是在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有的文獻種類。儘管處於同一個漢文化圈之中,但文化圈是變化的、動態的,要從根本上認識文化的結構和變遷,應該結合這些文獻本身的特徵,提煉出相應的問題,並可以批判地借鑒西方史學的方法。在這裏我需要略作補充,例如年鉴派史學家費爾南·布羅代爾(Fernand Braudel)曾提出三種歷史時間(長時段、中時段、短時段)的概念,尤其是他最為重視的“長時段”概念就較為合適運用在這批文獻的研究中。雖然布羅代爾自身的運用,在其《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》一書中較為成功,而在其《文明史》(這是英譯之名,法文版原書作“*Grammaire de civilisations*”,意為《文明的文法》)中就稍顯欠缺,但雅克·巴爾贊(Jacques Barzun)的巨著《從黎明到衰落: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,1500年至今》顯然是一部運用長時段眼光處理文化史的傑作,是值得借鑒的研究方法之一。反之,過分拘泥於“短時段”(即個別事件),往往會在歷史的塵埃和泡沫中失去有意義的判斷。這個問題,希望能夠引起學術界的廣泛注意。

二、文獻編。大致包含三方面內容,即考訂、解題和個案。如上所述,《燕行錄全集》的出版,對該領域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動力,此書由林基中教

授以一人之力編纂完成，功不可沒，但也同樣存在一些不可迴避的訛誤。爲了使這一研究具有更爲堅實的文獻基礎，對其中的訛誤作較爲仔細的勘正是非常必要的。左江《〈燕行錄全集〉考訂》是第一篇全面勘正其書的力作（此前 2003 年日本夫馬進教授在其《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》中對林編訛誤已有零星糾正），該文在 2007 年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並報告，引起中韓學者的關注，有很高的學術價值。與之先後，漆永祥也做了《〈燕行錄全集〉考誤》（載韓國高麗大學《中國學論叢》24 輯，2008 年），收在本書中的《關於“燕行錄”整理與研究諸問題之我見》是其另一篇力作，值得關注，其中所涉“燕行錄”概念亦可與緒論互參。解題屬於目錄學類的工作，優秀的解題可以起到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的作用，這項工作亦爲林編所欠缺者。“讀書班”是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爲完成《高麗朝鮮時代中國行紀資料彙編》的工作而組成的，“解題稿”是其部分成果。孫成旭則集中對十九世紀的燕行錄作解題，這些基礎性工作使用的是傳統的文獻學研究方法，顯然是行之有效的。還有兩篇論文屬個案研究，是就兩種“漂海錄”的版本及內容所作的具體考證，皆有意義。

三、專題編。按其內容分爲五個部分：第一組爲歷史學，從朴彥到鄭堉謨六文屬之。第二組爲文學，陳彝秋和陸小燕、葉少飛二文屬之。第三組爲形象學，陳彝秋、左江、曹虹三文屬之。第四組爲語言學，僅汪銀峰一文。第五組爲比較研究，陸小燕一文屬之。中國行紀文獻極爲豐富，不僅適合用“長時段”概念處理，也需要從不同方面和不同層面展開綜合研究。在我的初步設想中，大致可以從以下十個方面切入，即 1. 文獻學研究；2. 歷史學研究；3. 思想史研究；4. 民俗學研究；5. 宗教史研究；6. 語言學研究；7. 文學研究；8. 形象學研究；9. 書籍史研究；10. 比較研究。每個專題性質不一，問題各異，使用的方法也不同。以“形象學”而言，儘管是“異國人記中朝事迹之書”，但未必就“不參利害之見”，也未必就“頗能得真”。無論是文字還是圖繪，反映在筆下的“形象”往往都充滿了主觀的選擇和好惡，所以最後呈現出來的“形象”也往往是“變形”的。韓國高麗大學仁村紀念館所藏《混一歷代國都疆理之圖》，繪成於 1526 年至 1534 年之間，其中

日本所占面積遠遠小於朝鮮半島，雖然是地圖，實質上却是一種意志的反映，即“日本小國觀”。“形象”不是現實的複製品，看到的往往祇是一個人想看到的，所以，不同的人會看到不同的形象。朝鮮人眼中的中國形象，也是變動不居的，但在很長的時間段內，其變化是微小的，可以忽略不計，而放在一個“長時段”中，就能夠發現一些“小事件”在“大歷史”中的意義，一如在斯蒂芬·格林布拉特(Stephan Greenblatt)的筆下，十五世紀一本古羅馬哲學長詩《物性論》的發現，成為人類走向現代世界的契機(參見《大轉向：看世界如何步入現代》)。總之，大量的中國行紀文獻中蘊含着豐富的問題，徜徉於此類文獻中，就好像行走在“枝繁葉茂的熱帶雨林”，人們到了這裏“就會流連忘返”，每前進一步都會有令人驚異的發現，美國學者羅伯特·達恩頓(Robert Darnton)對歐美書籍史研究的形容正可以用來比況。

“燕行錄”研究在東亞方興未艾，希望奉獻給學界的這本小書，既能夠為這一研究搖旗吶喊，也能夠實質性地為之添磚加瓦。

目次

前言	張伯偉 / 1
----	---------

總論

名稱・文獻・方法

——關於“燕行錄”研究的若干問題	張伯偉 / 3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文獻編

《燕行錄全集》考訂	左江 / 29
關於“燕行錄”整理與研究諸問題之我見	漆永祥 / 62
朝鮮時代中國行紀資料解題稿(十七種)	讀書班 / 96
十九世紀燕行錄解題	孫成旭 / 136
散文抑或小說	
——張漢喆《漂海錄》撰述性質考辨	姚大勇 / 166
十九世紀初東亞漂海錄《乘槎錄》的編纂與版本	丁晨楠 / 185

專題編

- 權近《奉使錄》與明代淮揚衛所的高麗人軍戶 朴 彥 / 209
- 明代朝鮮燕行使臣“東國有人”的理想與現實 左 江 / 231
- 從朝鮮使臣的中國行紀看明代中後期的玉河館
——以會同館提督官為中心 陳彝秋 / 255
- 朝鮮王朝最後一任朝天使
——金堉使行研究 孫衛國 / 304
- 清代朝鮮燕行使團食宿考 左 江 / 330
- 李裕元乙亥燕行與東亞局勢
——以李鴻章與《江華島條約》為關照點 鄭堪謨 / 360
- 明初高麗使臣高郵懷古詩的文化內涵 陳彝秋 / 379
- 萬曆二十五年朝鮮安南使臣詩文問答析論 陸小燕 葉少飛 / 394
- 明初朝鮮半島使臣筆下的南京印象 陳彝秋 / 425
- 朝鮮士人的對清認識
——以送別燕行使臣詩文為中心的考察 左 江 / 441
- 朝鮮金景善《燕轅直指》的清朝觀 曹 虹 / 467
- 朝鮮朝燕行文獻與清代前期語言的使用
——以金昌業《老稼齋燕行日記》為中心 汪銀峰 / 483
- 康熙十三年安南使者的中國觀感與應對
——兼和朝鮮燕行文獻比較 陸小燕 / 492

總 論

名稱·文獻·方法

——關於“燕行錄”研究的若干問題

南京大學文學院 張伯偉

從高麗時代直至朝鮮時代末期的六百多年時間中，到中國的使團中有不少人留下了使行記錄，據估計，其總數當在七百種以上。關於這類文獻，最早是由韓國學者開始重視整理的，迄今為止，已出版若干種大型叢書。如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編《燕行錄選集》（1960—1962），民族文化推進會（今韓國古典翻譯院）編《國譯燕行錄選集》（1976—1982），林基中教授編《燕行錄全集》（2001），林基中和日本夫馬進教授合編《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》（2001），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編《燕行錄選集補遺》（2008），林基中編《燕行錄續集》（2008）等。2013年，韓國又推出了光盤版林基中編《燕行錄叢刊》，收錄作品四百五十五種。2014年，再次推出《增補燕行錄叢刊》，數量增加到五百五十六種。在中國海峽兩岸，對於此類文獻的重視也由來已久，並與日俱增，臺灣珪庭出版社曾出版《朝天錄》（1978），大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正陸續出版《燕行錄全編》（2010年起），復旦大學出版社有《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》（2011）等。無論中韓抑或兩岸，這些較為大型的資料集採用的都是影印原書的方式。我在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主持了一項韓國中央研究院的項目“高麗朝鮮時代中國行紀資料彙編”，選擇了有代表性的文獻近百種，標點整理，並附以解題、索

引，目前已完成大半。從以上情況來看，這些資料之受到韓國、日本和中國海峽兩岸學者的日益重視，是顯而易見的。然而如何看待及使用這些文獻，尚存在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，有待各國學者通過較為細緻的討論，才能够取得共識，以期更好地利用。本文擬拈出若干自覺重要的問題，提出一些初步意見，供大家批評或參考。

一、名稱

從高麗時代末期開始，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朝鮮時代的終結，朝鮮半島到中國的使團絡繹不絕，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往返途中及歸國之後有不少記錄，在明代的時候，常常以“朝天錄”命名，到清代則易之以“燕行錄”。現代學者在整理和使用這些文獻時，對其總體稱謂也以“燕行錄”最為流行，有的甚至還擴大到稱呼其他國家人員到中國的使行紀錄文獻^①。除此以外，也有一些別的稱謂，只是並不通行^②。“燕行錄”之稱雖然流行，也為學術界所熟悉，但據我看來，這不是一個合適的稱謂，縱然可以從俗，但在學理上應當予以更改。

為什麼說不合適？朝鮮半島與中國的來往，由來尚矣。其間始末，洪敬謨所言頗具概括性，其《燕槎彙苑總叙》云：

朝鮮，東海小國也。建國肇自檀君，遣使通中國又自其時……箕子代檀氏以王，白馬朝周，亦載于史……自三韓之時至羅、濟之初，皆詣樂浪、帶方二郡貢獻，而未嘗達於中國……至晉唐南北朝時，百濟

① 目前已經出版的各種大型相關文獻整理，無論是在韓國還是海峽兩岸，都以“燕行錄”（偶爾用“朝天錄”）來統稱，甚至把越南的中國行紀文獻也冠以“燕行”之稱。而實際上，越南使臣的記錄多以“北行”為名，或至廣州，或至天津，或至北京。

② 比如張存武《推展韓國的華行錄研究》（收入《韓國史學論叢》，首爾：探求堂，1992年）中提倡使用“華行錄”之稱，在朝鮮時代末期，也確有少數記錄就是以“華行”為名。徐東日《朝鮮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——以〈燕行錄〉〈朝天錄〉為中心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把這些文獻冠以“使華錄”之名。又楊雨蕾在其《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》一書中也偶爾用過“入華行紀”之稱，但也特別說明：“本文在總稱上基本採用學術界熟悉的‘燕行錄’之稱。”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1年，頁17）

始遣使……而皆非歲以爲常者也。及夫高麗統三爲一，傳國五百，南事宋而北事契丹，又事金、元。程里最近于諸國，故比年一聘……暨我本朝與皇明並立，而皇都在金陵，故航海而朝天。成祖皇帝之移都於燕京也，乃由旱路歷遼東，穿山海關而入皇城，蓋自我太宗朝己丑始也。皇朝，中華也，吾初受命之上國也……崇禎甲申，清人入主中國，我以畏天之故，含忍而又事之如皇明，今且爲二百年。^①

使行文獻的出現，亦始於高麗而大盛於朝鮮朝，這與兩國之間的來往頻繁是密切相關的。明代初年，“皇都在金陵，故航海而朝天”；明成祖遷都燕京，故自太宗九年（1409）也改由遼東入燕。當時的使行文獻，雖然有少數以“燕行”爲題名者，但多數的稱謂仍然是“朝天”。即便用“燕”，也仍然懷有“朝天”般的感情，如李民寔萬曆年間撰《題壬寅朝天錄後》云：“燕今爲天子之邑，四方之取極者於是，九夷八蠻之會同者於是，其宮室之壯，文物之盛，固非前代之可擬，斯亦偉矣！”^②明清鼎革之後，以“燕行”爲書名者比比皆是，幾乎看不到“朝天”之名。這種帶有整體性的名稱改換不是偶然現象，其背後是一種文化觀念在支撐。即便就其中唯一的例外——張錫駿在同治三年（1864）出使清朝的《朝天日記》而言，若結合其《春臯遺稿》中《朝天時驢行諸篇》一併閱讀，就可以發現，其所謂的“朝天”，還是以“有明遺臣”^③自居，去到“皇明先帝舊城壕”^④，繼承的是大明“三百年朝天之行”^⑤的傳統。送行者甚至有這樣的期待：“吾聞皇明之遺民，往往混迹於屠沽之間，而多感慨悲歌之士。吾子其彷徨察識於眉睫之間而得其人，因執策而語之曰：今天下貿貿焉皆入於腥穢氈裘之俗，而惟吾東國獨保皇明

① 《冠巖全書》冊十二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續第 113 冊，首爾：韓國古典翻譯院，2011 年，頁 336。

② 《敬亭集續集》卷四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 76 冊，首爾：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，1991 年，頁 523。

③ 《朝天日記》十二月十二日，《春臯遺稿》卷一，韓國中央研究院圖書館藏，頁三〇 a。

④ 李能燮贈詩，《春臯遺稿》卷一，頁四九 a。

⑤ 柳致任贈序，《春臯遺稿》卷一，頁六〇 a。

禮樂之教，祀而崇大報壇，花而種大明紅，紀年而先揭崇禎號。天王之一脈王春，獨在於檀箕故國我后之朝鮮矣。”^①而對於作者來說，此行最大遺憾，乃“不得與皇明古家遺裔吐筆舌、叙感慨、唱黍離、吊故都”^②。所以，書名中的“朝天”並非對滿清王朝的認可，而是對大明故國的懷念。

毫無疑問，“朝天”的名稱含有“事大之誠”的觀念，這幾乎是高麗朝以來君臣上下對中國皇帝信誓旦旦的“口頭禪”，其含有濃厚的政治意味是極為明顯的。“燕行”雖然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個地理方位的指向，但在明清之際由“朝天”向“燕行”的整體轉變中，它一方面代表了朝鮮士大夫對清朝“含忍而又事之”的無奈（如鄭太和有《飲冰錄》、蔡濟恭有《含忍錄》），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他們對滿清的鄙夷，認為這個政權不配被稱作“天朝”。特別是在將“燕行”與“朝天”對比的時候，這種觀念表現得尤為突出。茲列舉若干材料如下，李夏鎮《燕山述懷》：

朝天舊路行行愧，不是當年玉帛將。^③

李敏叙《送沈可晦赴燕》：

此路朝天前日事，遺民思漢至今悲。^④

柳尚運《燕行錄·呈正使案下》：

今行非復朝天路，隨遇空為感舊吟。^⑤

① 李宗淵贈序，《春臯遺稿》卷一，頁六三 b。

② 《朝天日記跋》，《春臯遺稿》卷一，頁四六 b。

③ 《六寓堂遺稿》冊二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續第 39 冊，首爾：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，2007 年，頁 68。

④ 《西河集》卷四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 144 冊，首爾：景仁文化社，1997 年，頁 61。

⑤ 《約齋集》卷二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續第 42 冊，頁 442。

崔錫鼎《送李參判光佐赴燕》：

昔我銜王命，十年再赴燕。衣冠今變夏，槎路舊朝天。^①

宋相琦《送冬至副使趙令錫五》：

莫說烏蠻館，生憎鴨水船。北來唯古月，西去豈朝天？^②

申光洙《洪君平名漢燕槎續詠序》：

不佞觀國朝前輩朝天詩多矣，方皇朝全盛時，赴京者多名公卿，與中國學士大夫揖讓上下，富禮樂文章之觀，故其詩率忠厚和平，有淪淪之音。左衽以來，入燕者徒見其休慆^③酪之俗，如皇極之殿，石鼓之經，辱諸腥穢，故其詩皆黍離也。所謂金臺易水、漸離荆卿之迹，不過借爲吾彷徨躑躅之地，人人而有悲憤不平之音……聞單于近益荒淫，或者天厭其穢，真主復作，君平奉國命入朝，睹中華文物之盛，雍容東歸，則於是乎又必有朝天錄，不佞願一寓目焉。^④

從這樣的對比中，我們不難發現，“朝天”或屬於往日的美好，或寄寓他日的期待，“燕行”則透露出當下的悲憤，甚至把清代皇帝稱作“古月”（胡）或“單于”。所以，由“朝天”轉變爲“燕行”，絕不僅僅是指代一個地理方位，而是充滿了政治意味和文化立場的特殊名稱。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言，使用這些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稱謂，無論是“朝天”還是“燕行”，都是不合適的。

我認爲合適的名稱是“中國行紀”。1998年8月，我寫過一篇《韓國歷

① 《明谷集》卷六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153冊，頁547。

② 《玉吾齋集》卷四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171冊，首爾：景仁文化社，1998年，頁301。

③ 原文誤作“潼”，茲以意改之。

④ 《石北集》卷十五，《韓國文集叢刊》第231冊，首爾：景仁文化社，2001年，頁482。